

“佛系”青年的生成机理与引导路径 ——以当代大学生为考察对象

■ 陶志欢

(上海大学 大学生研究中心, 上海 200444)

【摘要】大学生中存在的“佛系”现象可由话语和行动得到相互印证,并在消解主流文化中形成扩散效应,其背后潜藏着多元化的真实需求,是一种有限度的消极的善。其生成机理在于大学生生活兴趣度在功利化教育中渐趋消退,人生价值观在后现代思潮中愈发迷失,成长需求在短缺式供给中失去平衡,心理期待感在规则性冲突中产生落差。高校应努力营造公正、合理的校园环境,倡导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以机会供给激发学生的自我意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指引正确的方向,用理想信仰照亮学生的人生道路,借挫折训练和培养学生的责任观念。

【关键词】佛系青年 生成机理 引导路径 当代大学生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19.01.014

被认为是怀疑论鼻祖的古希腊哲学家皮罗说“最高的善就是不作任何判断,随着这种态度而来的就是灵魂的安宁。”^[1]由他的这一体现为“搁置判断”的怀疑论思想而产生的“不动心”的生活态度在两千多年后的中国大学生中又有了一批“铁粉”。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这一体现青年事业发展顶层设计的《规划》明确提出,要注重激发青年的参与热情和创新活力,促进青年的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2]。然而,在作为青年群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生中,却存在着一个校园参与和融入程度低、对学习“不动心”的群体。他们的主要表现是对课堂讨论不积极,对班团活动不热情,对规章制度不重视,对作弊逃课不畏惧,对成绩好坏不在乎,对评奖推优不感冒……甚至有时他们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的大学越上越迷茫?”^[3]他们好像既不珍视什么价值,也从未感到过什么威胁,甚至对所有价值都持漠视的态度,处于一种漠然和麻木的状态^[4]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和以不变应万变的架势,似乎已成为对任何事情都已无所谓的“佛系”青年。这一大学生群体与世无争的态度已成为大学校园青年亚文化的典型表征之一。究竟应当如何审视此群体,这种心理的形成机理是什么,如何教育引导?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一、“佛系”青年的表征

表征是指概念的一个或一组客体特性的抽象概括和外呈现,科学地解读表征通常也就意

收稿日期:2018-12-08

作者简介:陶志欢,上海大学大学生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青年思想与教育。

味着把概念的内涵揭示出来。通过对大学生中“佛系”青年表征的具体呈现,我们可以把握其所具有的深刻内涵,进而认清“佛系”大学生的本质。

1. “佛系”存在: 话语和行动的相互印证

“佛系”话语能让失意青年规避尴尬、走出难堪、摆脱窘境,是一种用云淡风轻的语言包装找到与社会进行对话和解的新方式,其中虽暗含着对意义争夺和价值操控的温和式反抗,却可以使青年学生缓解个体压力和舒缓精神焦虑,并在其中找到群体归属感、刷出自身存在感。“佛系”大学生爱把“没意思”挂在嘴边,奉行“不争不抢、不求输赢、有无均可”的生活信条。在语言上,这些学生的惯用语是“都行、可以、没关系”、“随他去”、“不关我事”、“都拉倒吧”、“感觉身体被掏空,干什么都没劲”、“只要我乐意,有什么不可以”、“太多选择,我选择不选择”等。由于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隐或显地蕴含着说话者的某种心态,因此,上述话语可以进一步延伸解读为“遇事没主见,做事没原则,干事没胆略,是非没立场”。

在行动上,目标规划的“不作为”、实践行动的“慢作为”以及面对压力挑战的“退作为”是“佛系”大学生的行为表征。对学业成绩好坏的不在乎、对校园文化活动的不积极以及对相关目标的低认同都是具体佐证。另外,研究还表明,“佛系”青年占比与高校的办学水平和层次呈负相关关系,且不同层次的高校中这一群体的占比都在逐年提升^[5]。

2. “佛系”效应: 在消解主流文化中扩散

任何一种亚文化都必然体现为对主流文化的价值偏离和仪式对抗,即便其并非刻意为之,但在客观上也会产生这种效果。以学业成绩表征的知识和以生活能力展示的实践是大学传播校园主流文化的两个基本向度和承载手段。对于前者,有些学生并不把优秀作为目标,而是通过即可,即便不通过也能坦然接受,情绪上并无太大波动;对于后者,大学生的热情一般不会持续太久。两者都呈现出当代大学生真心想成“佛”的无为而活的状态。此外,对校园主流文化淡然以对的态度也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情况。前者是指只对校园主流文化不感兴趣,另有所爱,是“选择性佛系”;后者则是指对校园主流文化活动在内的所有活动全无所爱,是“彻底性佛系”。这种对校园主流文化构成消解效应和解构作用的一切态度和超然、超脱情怀已成当代青年亚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部分青年的“佛性”人生态度与佛教中的四大皆空、六根清静、内心反省的人生境界在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但与佛教蕴含的乐善好施的公众情怀、普度众生的使命意识等佛学真谛相去甚远,甚至截然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一种概念符号的借用。

3. “佛系”真相: 潜藏多元化的真实需求

“佛系”脱胎演变于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早先的“丧文化”。它既是一种自我抑制式的心理管控,又在尝试重新建构自我认同。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学生面对风险时采取的带有“内卷化效应”的自我保护行为,毕竟持有“佛系”态度比公开表达对抗和不满更易获得安全感。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审视,其所谓的“不争”又恰是一种抗争;其所谓的“不走心”其实是对无效信息或其所不认同的价值观的一种主动无视。表面上看是在沉默或消极逃避,其实是在呐喊或积极掩饰。那些秉持潇洒超脱态度的学生其实并非真的无欲无求,而往往另有隐情。作为精神胜利法的新样态,不论是出于悲观发出的“佛系”抱怨,还是出于无奈产生的“佛系”感慨,客观上都有利于青年舒缓压力,找到一种与骨感现实和平相处的新方式,而一旦形势稍有转机,“佛系”瞬间就有可能变成“沸系”,口称“佛系”而默默努力者大有人在,其展示的弱风格化和身份的自我模糊性以及内在冲突性都充分表明,部分学生所谓的与世无争和看淡一切的态度多是一种自我掩饰的负性假象,充满着被迫成“佛”的无奈与无助。其“超脱的”行为表象的背后潜藏着他们复杂的心理和多样化的真实需求。

4. “佛系”价值: 一种有限程度的消极的善

客观存在的社会压力、媒体渲染的焦虑环境以及阶层固化的命运预设,似乎都在预示部分人不会实现所谓的“成功”,或者精神上体验不到自己的成功。由于一切成功与失败、幸福与不幸的衡量标准多源自现实人与身边人的比较,在相对剥夺感日盛的情形下,他人的成功通常也暗示着自己的失败,从而给自己带来严重的挫败感。“佛系”青年确有无能改变现实而充满无奈的软弱,但也暗含着自我觉醒、拒绝盲从现实的抗争。这种抗争不是通过做什么而是经由什么都不做来达成内心的暂时平衡,因此可以说,“佛系”在看似荒诞的表象背后隐藏着另一种意义上的理性。与世无争正是这些学生自我预先设置、通过彰显“假意我是佛”来构建的一种心理防卫机制,体现着一种消极的善。在网络时代,这是沉迷在虚拟世界里的大学毕业生采用的逃避和不反抗的方式,它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秩序扭曲以及结构正义缺失的不满,且通过融入二次元群体进而消弭自我认同危机和寻求精神层面的慰藉^[6]。人的精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做不到对所有事物都采取有所谓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有所不为正是为了在其他领域有所为,进而表现为有所谓。这种特定状态下的超然态度折射出大学生的豁达和自我目标感。

二、“佛系”青年的生成机理

熊秉元先生在《解释的工具: 生活中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 社会现象的出现都有背后支持的条件——存在不一定合理,但是存在一定有原因^[7]。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佛系”大学毕业生生成机理,搞清楚是哪些因素导致这一青年亚文化现象的形成。

1. 大学生生活兴趣度在功利化教育中渐趋消退

优化理论认为,价值判断只有基于个人的兴趣、偏好、个性和天赋才有意义。以无所谓的态度来面对学习生活,意味着个人兴趣的丧失。兴趣在心理学上被界定为人积极从事某种活动或探究某种事物的心理倾向。把兴趣仅仅解读为对事物表面的关心有失偏颇,其实它更多地说明了基于获得某方面的知识或参与某种活动而使人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个体对某事物具有兴趣往往表现为能从中感到愉悦而积极主动参与。相反,兴趣缺失的人,则会感到枯燥无味,精神上无精打采,缺乏生机与活力。

在现实中,本应充满生命活力与崇高理想的教育却失于简单化与功利化。“学习有用技能——通过相关考试——增强就业能力——获得地位和财富”,这是不少学生信奉的、教育应当遵循的唯一内在逻辑。当教育不能提供这些利益并导致无法达成所愿时,“读书无用论”或“学历贬值论”就产生了。这是看似合情合理的应试教育与就业思想指导下的教育的必然结果,更是人类在科学技术不断战胜自然和突破社会历史束缚从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满足感和工具理性不断膨胀的必然结果。而工具理性的泛滥对人造成的最大危害是使其意识活动手段化和思维方式程式化,进而导致人本身的价值异化。学生逐渐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时刻为求职做准备的实用主义者。欲望逻辑支配下的现代化在提供给人们丰富物质的同时,消极后果之一必然是不断制造“空洞主体”,当代大学生“空心病”的生成便是遵循这一逻辑。物质和精神在人类生活的长时空范围内似乎在进行一个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物质主义在生活中的全面贯彻必然挤压人们精神活动的空间。因为工具理性不具备任何的价值建构能力和意义赋予功能。其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就是重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欠缺对人这一主体本身的人文关怀;忽视人的思想情感和人格尊严,忘记了教育的本质是灵魂的唤醒,真正的教育应该是赋予人“定义美好”的能力和“建设美好”的愿景。

科顿姆曾说过:“教育让人们思考得太多,而忘记了如何去感受。”^[8]在校园中,文化与知识

的融汇贯通太少,关怀与要求的并存不多,情感与规定的共生不够。要么专业教育中缺失思想教育、知识教育中难见信仰教育;要么思想教育专业化、信仰教育知识化。这些都造成教育的育人价值和职业功能无法同在和并存。教育的旨归不是成“人”,而是雕“材”和琢“器”,这使发展和培养学生良好的兴趣变得艰难。工具理性支配下的教育体制是酝酿当代大学生“佛系”人生的温床,为其生成提供了最适宜的场域。

2. 大学生人生价值观在后现代思潮中愈发迷失

在我国青年亚文化的产生和流行过程中,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其中起着理论基础来源和价值规范导向的作用^[9]。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甚至“后现代”的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达成共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思潮属于人类意识范畴,意识源于存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源于20世纪60年代,它是西方国家充分发展从而出现“后现代性”社会特质的产物。美国二战后出现的“颓废的一代”或曰“垮掉的一代”就曾深受充满非理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这种思潮所具有的价值取向多元化、价值判断简单化、价值传播个体化的特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性、厚重性和准确性构成严重的冲击、消解和抵牾。其主张对所有事物进行解构,推崇“去理性化”、“去公共性”、“去超越化”、“反对崇高、拒绝高雅”的无权威、无标准、无中心的多元化价值规范体系,关注点从充满价值导向的严肃国家政治生活转向对自身生活意义世界的探寻和当下人生幸福的追问。加之个体化进程的加速导致集体意识隐退,以及从“乡土中国”传统血亲人伦关系到陌生人秩序构建的过程中存在着漫长的“非制度化生存”环境,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主张的摆脱现实窠臼的束缚,崇尚生活自由、个性表达与身体解放提供了现实土壤。

后现代主义思潮认为,社会关系普遍受权力支配而非个人能力掌控,不存在对行为后果负责的正当理由,所以应极力规避责任。后现代主义思潮主张只追求以娱乐至上为旨归的感性满足,甚至奉行“功利主义”和推崇“短视行为”。由于理想太远而不能至,目标太高而不能及,所以要及时行乐、得过且过,追寻满足个人虚荣的俗幸福和伪幸福,每个人都只需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从而掌控自己的命运。在这种社会思潮看来,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和不可比较的,我的真实感觉就是真理标准,没有什么事物具有确定性和合理性的标准及意义。如果说生命真的有什么意义的话,那无非是人类刻意主动自我建构的结果。就像《人类简史》的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指出的那样“从我们所知的纯粹科学角度来看,人类的生命完全没有意义。人类的行动没有什么神圣的整体计划,而且如果整个地球明天早上就爆炸消失,整个宇宙很可能还是一样这么继续运行下去。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不能排除掉人类主观的因素。但这也就是说,我们对生活所赋予的任何意义,其实都只是错觉。”^[10]因此,追求和考量是非对错、成败得失也显得多余,受这种思潮影响的一部分大学生对一切事物抱着出世超然的态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3. 大学生成长需求在短缺式供给中失去平衡

人的成长既需要物质的保障,也需要精神的滋养,它们分别给人的成长提供生理和心理发展的条件。对于人的发展来说,观念的精神需要比直接的自然需要更加重要。因为它具有解构性,能够使人摆脱自然的必然性^[11]。而且,精神生活领域的问题会在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满足后逐渐显露出来,两者具有非同步性。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早就断言,人类的文明程度越高,心理压力反而越大。这一看似充满悖论的断言却逼真地揭示了当代人充满内在冲突的生存状态。

当前部分大学生崇尚精致利己和娱乐至上,但利己无原则就会消解崇高,娱乐无底线就会丧失神圣。伴随精神危机感、虚无感的和看淡一切的心态的,正是他们缺乏意义感和存在感的表现,即心理需求强化与社会支持弱化构成强烈反差。马斯洛的梯级需求理论认为,人有从低

到高的生理、安全、归属和爱、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且这些需求在实际生活中呈现出非线性波动,在条件限制下不可能得到完全满足。低层次需求还未满足的人,当看到他人高层次需求满足带来的幸福感时,往往会出现“羡慕嫉妒恨”等心理反应。这种心理不适会产生企图遮蔽和尽力掩盖的反向症候,使人表面上摆出一副“淡然”的态度来自我欺骗。正所谓一个人越极力宣称拥有什么,恰恰折射出其内心深处越缺少什么,外在和心里之间存在一种匀速相背而行的两极化的张力。

Alderfer的ERG理论认为,人的需求有生存、相互关系和成长发展三个层次,当高层需求受挫时,作为带有不自觉和潜意识性质的替代性解决方案——低层需求可能会有所增加和自我强化,以此来虚假填补因高层需求受挫而留下的空白感和失落感,呈现出一种带有“跷跷板效应”的“受挫——回归”现象。我们认为,这个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大学生的“佛系”态度。“佛系”主要是源于高层需求被长期压制、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从而开启自己的游戏人生模式,建构自身无为而活的心理状态。加之在当前社会上成功标准单一化,青年在向外的追求受挫后容易转向自我内部的心理建设,沉溺于低层次需求或虚拟世界来满足自我虚假实现,进而“欺骗”式地满足自身的高层需求。

4. 大学生心理期待感在规则性冲突中产生落差

对于青年由“抗争”到“出世”、由“愤青”到“默青”(沉默的青年)的转变因由,美国学者John L. Saari的观点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他认为,年轻人生活在规则不同的两个世界:一个是传统中国式社会化主宰的家庭世界,注重培养孩子伦理道德的规则意识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另一个是社会世界,这里具有催生孩子个性生成的多元价值观。两个相对独立的世界会在精神上撕裂青年群体,产生社会伦理规范与个人道德操守的悖论。前者还带有“乡土中国”的痕迹,后者却是成熟市场经济催生的陌生人的社会秩序。两个世界的规则碰撞、两种秩序的价值对立、双重观念的内在冲突都注定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无法准确定位自己。

今天的大学生没有逃脱两个世界的冲突带给他们的纠缠。精神与物质的撕裂、传统与现代的对抗、规则与个性的冲突模糊了他们看待未来的视线,也扰乱了其正常的社会角色扮演。传统规则宣扬奉献进取、循规蹈矩。但当代大学生已成为“消费拜物教”的忠实信徒,校园早已被价值异化的摩登时尚消费和虚假符号消费所充斥,已成为鲍德里亚眼中被“虚假需求”主导的消费社会的浓缩版。“佛系”既可能是消费主义的症状,也可能是缓解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症状的解药。在当代大学生看来,传统规则文化太过迂腐陈旧,不能为其追求梦想提供观念意义的遵循和现实路径的指引;但是,积极进取和崇尚奋斗的主导价值观念所描绘的社会背景和底色以及由此产生的单通道社会,无形中给当代大学生带来了落后于人的恐慌感和惧怕失败的焦虑感。这又使得他们不能过于漠视现实,于是在波伏瓦的打破传统、追求自由与弗洛姆笔下的“逃避自由”之间摇摆,既有“力不从心”的无奈感,也有“微不足道”的渺小感。

两个世界的矛盾导致大学生出现心理期待落差,进而产生面对学习生活的超然态度。“佛系”人生正是在这种夹缝中产生和形塑的,它是当代青年努力追求精神高尚却又不得不顺从俗化现实的矛盾心态的合理化呈现。因此,“佛系”话语不是简单的网络传播现象,它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现实文化内涵,体现了当今青年人在多重社会压力面前希望改变现实的态度,和在模糊冲突的规则秩序中期待走出困境、无问西东地追求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业的新动向和新趋势。

三、“佛系”青年的引导路径

当前,党和政府正努力营造公正、合理的社会环境,积极倡导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并为

此提供根本的政治保障。青年的心态虽在根本上受制于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但亦有其自身相对的独立性和特有的运行规律。承担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不能放任学生不良心态的蔓延,必须有所作为。“佛系”作为一种群体现象,具有很强的传染性^[12],对其实施正确引导十分迫切。

1. 以机会供给激发大学生的自我意识

学界提出的“青年消失论”是五四以来青年角色的生成机理、以拥有家国情怀的热血青年为代表的青年形象和青春想象在我们观念和印象中日益消退的结果。其根源在于青年自我意识的消失。实际上,生活在现实世界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著标志之一。那些表面上什么都无所谓的大学生,其内心深处一定有其有所谓和在乎的东西,关键是要深入挖掘和合理激发。

机会供给是激发大学生自我意识的重要方式。马克思在批评形而上学时曾提到,哲学家只不过是不同地解释了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可以说,认识自己是为了改变自己。高校教育者的重要任务是让大学生找到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 Lev Vygotsky 提出的“最近发展区”,然后按照不同的规则和路径,因人而异地进行引导,就像筛网一样,针对不同的豆子用不同孔径的筛网进行分拣,巧用“登门槛效应”和“皮格马利翁效应”来激发学生的自我意识,帮助学生努力实现自我追求,使其最终成功走出美国心理学家 Martin E. P. Seligman 提出的“习得性无助”。

高校如何搭建让学生展示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多层次平台,正如在筛豆子时选择何种类型的筛网。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年,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13]《规划》也提出,要科学设计开展实践育人活动,丰富学生创新实践平台,实现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14],从而使不同类型的学生都能明确自己的身份和责任,进而弥合现实生活与观念世界的裂痕,跨越自我成就与社会期待的鸿沟,使学生在学校乃至未来的社会中找到合理定位,以归属感来重建他们的生活兴趣和对社会的信心,找回渴望已久的参与热情与创新活力,从以沉默来表达的“愤青”变为以激情来展示的“奋青”。就像黑格尔指出的那样,人不能像动物那样随遇而安,并且作为精神,他也不应该随遇而安^[15]。

2.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指引大学生的前进方向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文译本序里曾指出,我们如今的物质生活比任何时候都要丰富,而内心的厌烦空虚却比比任何时代都要严重。这似乎是当代很多国人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它仿佛印证了叔本华本人针对此书出版时无人问津的情形自嘲的那样:这本书不是为当代人所著,而是为后代人所写的。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是,物质世界里的逐利法则和等价交换、零和博弈和排他占有并不适用于精神世界,观念生活自有其独立的价值规范体系和内在评价标准,具有在共享中实现幸福、在共赢中成就梦想的基本特征,而且要有主导价值坐标以防人们陷入撕裂、心灵无处安顿。在一个没有主流权威和价值标准的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从而缺失前进的动力和迷失奋斗的方向。人生的意义、人格的崇高和人性的神圣由此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必将把人带入存在的荒谬感、主观的苍白感和生活的陌生感之中,进而不自觉地滑向价值观的相对主义、历史观的虚无主义和人生观的享乐主义。就像罗洛·梅所言“人类的焦虑、迷惑与空虚——现代人的慢性心理疾病——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他的价值观是混乱的、矛盾的,而且他没有心理核心。”^[16]

当前,我们的社会还未建立起“单纯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完全改变命运”的体制机制,党和政府在号召个体为实现自我而努力奋斗时,甚至已经喊出了“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的口号。这的确毫无疑问,但令人无奈的是,努力奋斗了却并不一定能实现自我。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还在无形中消解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正效应,这些都是“佛系”大学生产生的现实场

域。在境外多种思潮影响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主导变为主流需要漫长的过程。在新旧价值观念激烈交锋的罅隙间和空档期,人们会不自觉地迷失在标准不清而失去合理评判的社会里。

对于学校而言,校园里没有主流文化权威和核心价值观,学生的行为就无所谓对错与好坏。因此,校园要及时重构权威标准和核心价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内化为学生的坚定信念,外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尤其不能在关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而特别“有所谓”的事情上,犹抱琵琶半遮面,模糊不清、含糊其辞、遮遮掩掩,在可能影响学生是非对错、成败与否的观念问题上,必须给其立标准、定原则,为当代大学生的成长指明正确的方向,确保学生不因价值冲突导致的观念混乱和角色模糊而缺失评价依据,不以“无所谓”心态和“无所为”行动来面对应该引起关注并且需要很在乎、应该有所谓并且理应有为的事情,促进学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做用科学思想价值观念引领正确方向的时代弄潮儿。

3. 用理想信仰照亮大学生的人生道路

人是物质与精神的聚合物,是现实与理想的结合体,需要生活在现实与理想的共同体中。公正社会环境的营造是驱赶“佛系”心态的基础性工程。理想照亮并温暖着现实,也挑战并改变着现实。理想与信仰的树立是人类矫正以往精神生活失衡、努力摆脱现实中由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寻求由确定性体现的安全感的表现,也彰显着人类追寻生活意义的努力。正如尼采所言:“只要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几乎什么都能够忍受。生活有意义,就算在困境中也能甘之如饴;生活无意义,就算在顺境中也度日如年。”^[17]理想与信仰不是虚幻的,需要切实的学习生活目标来外化和具化。目标导向的实质是结果驱动,其指向是欲望的激发。正如麦凯指出的,“诚然,我们需要关注现在,我们也会从每一个以前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欲望,没有在脑海中考虑未来,那么我们会走到何处,又如何能经历等待兴奋来临的特殊感觉?”^[18]也就是说,一个没有理想和目标的人容易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终日过着无意义的生活。后现代主义者经常认为他们可以怀疑一切确定的基础。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值得一提。就像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指出的:能够辨清自己的需要(即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是一个重要的心理成就^[19]。

要使大学生改变得过且过的态度、拥有面对各种机遇与挑战的激情,必须鼓励他们重构在现实环境下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人生理想与生活目标,因为这些可以为他们的行动提供动力,使他们对与目标相关的领域变得有所谓起来。同时还要像《规划》中所要求的,面向大学生广泛开展“与信仰对话”的主题活动,引导他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20]。应特别指出的是,要注意把理想信念的抽象性、长远性与实际情况的指向性、阶段性有机地统一结合起来,让大学生明确当下应该做什么,进而构筑起远大的理想和树立起坚定的信念。

4. 借挫折训练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意识

众所周知,成功者的一个共同特质就是输得起、挺得住、赢得稳。这种对待输赢的智慧和能力,曾被美国学者保罗·斯托茨(Pau. G. Stoltz)称之为“逆境智商”(也称“挫折商”)。心理学家一般认为,在智商和情商相似的情形下,一个人能有多大的成就主要取决于“挫折商”。当代大学生在我国快速融入全球化的时代中成长,他们身上一般不会有刻骨铭心的政治历史伤痛,也不会有曲折离奇的悲壮故事记忆,他们拥有的可能是虚拟世界的真实感和真实世界的虚拟感相互交织、情感负担重与现实感脆弱同在、他控强化与自控弱化并存、物质世界丰富与精神生活贫乏共生,还可能面对包含着家人殷切关爱和细心呵护的“只许赢,绝不能输”的不恰当的教育方

式。他们“幸福并可怜着”。这是因为他们从未真正遭遇挫折。因此,必须引导他们提高抗挫能力,磨炼抗挫意志,锤炼抗挫心理,最终提升“挫折商”。正像有学者所言,学会如何面对挫折才是唯一真正重要的学问^[21]。

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感迫在眉睫。从出生起就带着“孤独感”并且不愁吃穿的这一代大学生,似乎先天已经从物质世界中解放出来,提前进入存在主义者所宣称的、由“空心病”引发的充满本体论焦虑的后物质时代。于是,他们不由自主地过早思考一个带有终极命题的哲学问题:我存在的价值究竟何在,使命和责任是什么?正像有学者所言,正是人、物、货币集中的刺激制造了神经系统的巅峰,引发了自我保全的反应,最终不可避免地将自我的个性拖向毫无价值的感觉,一种自我隐退的冲动^[22]。责任感的缺失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现代性的必然消极后果,它使得一些大学生以出世的态度应对一些本该在入世中有所谓的、“佛系”青年眼中的“人间俗事”。因此,必须按照《规划》中所指出的:深化教育改革,把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法治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重点任务贯彻到学校教育的全过程^[23]。逃避重大责任、无视应有责任、忽略细微责任都是不该有的态度。大学生应当越压越强、越挫越勇,带着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去实现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当代大学生的角色期待。

[参 考 文 献]

-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7页。
- [2][14][20][23]中共中央国务院《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载《人民日报》2017年4月14日。
- [3]《一名大三学生致信本报:为什么我的大学越上越迷茫》,载《中国青年报》2012年1月7日。
- [4]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页。
- [5]刘诗仑《大学生“橡皮人”的存在状态及干预策略》,载《大学(研究版)》2016年第4期。
- [6]李伟《新媒体时代大学生亚文化现象的批判性分析》,载《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9期。
- [7]熊秉元《解释的工具:生活中的经济学原理》,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276页。
- [8][21]丹尼尔·科顿姆《教育为何是无用的》,仇蓓玲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5、14页。
- [9]陈龙《区隔、生产、现代性症候——“佛系”文化的三种维度》,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4期。
- [10][17]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370、369页。
- [11]王金林《佛系:反消费症候或内置式出走》,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4期。
- [12]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 [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
- [1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6页。
- [16]罗洛·梅《人的自我寻求》,郭本禹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页。
- [18]休·麦凯《欲望心理学》,王莹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32页。
- [19]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5页。
- [22]朱军《负性幻觉——“佛系”的精神分析》,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4期。

(责任编辑:王俊华)